

历史不会终结

韩庆祥 黄相怀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历史不会终结

韩庆祥 黄相怀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不会终结 / 韩庆祥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300-25127-1

I. ①历… II. ①韩… III. ①政治-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D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2515 号

历史不会终结

韩庆祥 黄相怀 等 著

Lishi Bu Hui Zhongji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1.2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5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撰写人员：

韩庆祥 黄相怀 赵 培 王海滨 张慧君
郇 雷 张 严 陈积敏 徐浩然

从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

从人学角度总体审视当代社会发展，首要应思考的是资本与人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文本中的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

马克思毕其一生的理论探究，就是在“书房与现实”的结合互动中，揭示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这是他整个思想理论的主题和主线，他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和主线而展开的。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历程，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和主线而进行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基于人本主义或价值尺度，展开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在他那里，异化劳动有四种基本形式：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人和人的异化。其中蕴含的逻辑，就是马克思从对劳动的思考走向对资本的关注，从对物的思考走向对人的关注，其落脚点是人和人的异化；而资本背后的实质，是人和人的经济社会关系。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六条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要实现一种转变，即从对人的类本质的价值关注走向对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历史分析，为从历史尺度出发研究社会历史发展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一步一步地研究现实的个人内生出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唯物史观从历史尺度出发研究问题，确立起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问题

和人的发展问题的历史尺度。在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人的尺度）的统一，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尺度看到了资本的历史进步方面，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运用价值尺度看待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了资本的历史局限，即它使人丧失了自主个性。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要超越资本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走向人的逻辑，力求构建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联合体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来系统揭示资本的逻辑走向人的逻辑。马克思首先运用历史尺度，力求揭示“物的依赖”、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导逻辑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资本的逻辑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他又运用价值尺度，力求揭示资本“吃人”的本性。他认为资本的逻辑是把资本当作社会的主体和目的，而把人当作资本增殖的客体和手段，因而应超越“物的依赖”和资本主导的逻辑，走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实际上，整个马克思学说的总问题，就是分析揭示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由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以真正解决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的问题。

当代西方社会资本逻辑的困境

当今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困境，资本主导的逻辑是导致当今西方社会陷入困境的总根源。笔者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基因和性质决定了西方社会在各个领域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资本主导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从历史来看，资本创造了近代工业文明和西方文明，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然而，就其实质来讲，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殖，是通过榨取剩余劳动而使自身增殖，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压低工人工资来获取最大利润）；而资本运动是无休止的，哪里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它就会出现在哪里，同时危机也会出现在哪里。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都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天生具有

的剥削、“吃人”、扩张、掠夺的本性，资本扩张到哪里，资本就会在哪里“吃人”，资本的战车也会开到哪里。

资本主导的逻辑以在全世界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当西方社会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过度攫取并挥霍超额利润，使得全球市场出现“社会需要”严重不足时，当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必然出现困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困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西方社会陷入的困境，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治领域体现为政府调节无力，在社会领域聚焦为贫富差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展现为虚伪性暴露。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三大赤字，即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西方困境或三大赤字，说到底是由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所导致的制度基因和缺陷造成的，是基因型、制度性缺陷。资本主导的逻辑一定意义上能解决“物”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人”的问题，而且会给人的发展带来灾难。这就为“人的逻辑”出场提供了宏大的世界性场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

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始在经济领域利用和运作资本。从历史角度来看，在一定历史时期，我国在经济领域利用资本要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激活其他生产要素，拉动经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于是，便出现了对资本的运用和管理问题，即资本投资、资本运作、资本经营、资本监管等。应当说，在资本运作问题上，我国主要把它限定在经济领域，因此我国没有出现资本占有整个社会劳动并控制整个社会的所谓资本主导的逻辑。然而，投资规模驱动和资本运作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二是出现了权钱交易或资本围猎权力进而污染政商关系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要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彰显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围绕这一逻辑走向，在实践上，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是学会利用和限制资本，使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二是割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的纽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可以利用资本，但不能被资本所俘虏；可以运用资本，但要严格限制资本，不能让资本占主导；可以用投资规模驱动，但要坚决反对资本围猎权力。三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即“亲”“清”关系。四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五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根本利益当作尺度，坚持人民至上。

韩庆祥

2018年10月1日

|| 目录 ||

导言 资本主导下的西方困局	1
第一章 资本主导的逻辑	13
第二章 资本主导下的西方扩张	26
第三章 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困境	44
第四章 资本主导下的政治困境	69
第五章 资本主导下的社会困境	88
第六章 资本主导下的文化困境	115
第七章 资本主导下的外交困境	125
第八章 从资本逻辑看中国自信	147
跋	167

资本主导下的西方困局

1989年夏，美国日裔学者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后来，在综合各种反馈意见和学术观点后，福山撰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华盛顿邮报》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它令人敬畏……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深刻、现实、重要……是对目前全世界的变化及其广度的非常深刻的研究。”

然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吗？显然没有。

2008年9月15日，对于当代世界历史而言，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品味的日子。有着158年悠久历史、在美国抵押贷款债券业连续40年独占鳌头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正式宣布申请破产保护。雷曼兄弟破产，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实际上，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对理论家观点的不认同——只不过是从另一方面表明了这点而已。

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频频发生问题，如民主乱象、人权乱景、经济困境、民生困难、安全困局等。探讨这些问题和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于更清晰地认识西方的制度缺陷与民主危机，更坚定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主导是西方困局的深层根源。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各个方面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通

过运动实现价值增殖，而资本的运动是无止境的，哪里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它就会推进到哪里。资本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统领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资本主导的逻辑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当某个阶段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出现困境。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困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导的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史。在遇到阻碍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惜动用武力来为资本扩张开辟道路。冷战期间的两大阵营对峙，暂时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肆意扩张，也使得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进化”，形成了新的“变体”，即整个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制度安排等在美国的主导下实现了高度的“一体化”。从此，资本主义不再是以某一种单一面目出现的“单体”，而是以高度一体化、综合性面目出现的“复合体”。

冷战结束后，资本主导的逻辑借助“一体化”的西方这个前所未有的霸权力量迅速在全球扩张，从而形成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导的逻辑决定了西方国家必然对外采取扩张、控制战略，以牢牢占据世界体系的霸主位置；为了稳固国内基础，又必然对内采取安抚、绥靖、缓和策略，把居于霸主位置所获“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分配到本国内部。这种体系格局，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达到了顶峰。但是，西方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过度攫取并挥霍“超额利润”，使得全球市场出现了“社会需要”严重不足，或者说，“社会需要”增长的步伐远远赶不上资本扩张的步伐，全球市场被扩张完毕之后，就出现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就是以增殖为本性的西方资本耗竭其资本增殖的全球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西方国家，全面暴露了资本主导之下的种种困境，西方国家为了采取安抚、绥靖、缓和策略所实施的各种制度安排，反过来又使西方难以摆脱这种困境，从而使西方陷入了制度性困局。当今西方世界的种种乱象，都可以从以资本为主导的这种制度性困局中找到答案。

一、“自由市场神化”的破灭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由此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实际上是向众多国家开出新自由主义药方。然而，这一药方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尖锐的质疑。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曾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经典之作”，但实践证明，这也是“华盛顿共识”最大的败笔。由“华盛顿共识”，人们可以引出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新认识。

不可否认的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制，对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确实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但是，就其提升社会生产力的方式而言，却存在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经济体系，这是资本主导逻辑的必然选择。在这一经济体系之下，各种生产要素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组合，从而创造出最有效率的生产关系和最高的生产力。西方所谓的“自由市场体系”，实际上是以资本为主导的、以利润为牵引的由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劳动力升级等构成的一个经济运行体系。冷战时期，得益于二战红利、技术垄断、较高的劳动者素质、军事实力、西方国家内部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掠取等因素，这一经济运行体系得以以较高的水平和效率运行，为西方国家所认为的“不战而胜”奠定了基础。

冷战结束之后所形成的西方空前的霸权地位，使得资本主导的逻辑在全球扩张获得了最便利的条件，已经进化为“复合体”的西方国家得以在全世界不遗余力、相对有力地推广西方的“自由市场体系”。这一“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种生产要素的过程。这一过程，从表象上表现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实质上则是西方国家前所未有地获得了经济全球化的“超额利润”，西方国家因此迎来了二战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当今关于西方的种种意识形态上

的“神话”，特别是“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思想根源上都来自于此。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说辞。

但是，资本主导驱动下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也埋下了当今西方经济困境之祸根。本来，冷战时期的西方经济运行体系，是以资本为主导配置和调剂包括技术、市场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内的“实业型”经济体系，也就是说，是一个实体经济占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而一旦把“自由市场体系”的这套做法放大到全世界范围，精明的西方国家发现，与资本运作相比，搞实业太苦太累了，赚钱太慢了，“让那些新兴市场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去赚些又苦又累的‘慢钱’吧，我们只要在资本市场上赚‘快钱’赚得盆满钵满就好了！”于是，底特律衰败了，华尔街则持续繁荣！

“虚拟经济”确实比“实体经济”来钱快且多，但精明的西方国家没有算计到的是，这种“眼里只有钱”的做法，存在着内在的深刻的难以克服的弊病。要想维持“虚拟经济”的发展繁荣，西方国家一方面要为资本找到攫取剩余价值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必须实现资本连同剩余价值的“回笼”，而要想让资本连同剩余价值“回笼”到西方国家，必须创造出吸附和沉淀资金的机制和空间。于是，以不断“发明”金融衍生品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就被制造出来了。但是，金融衍生品寄居于西方国家，必须有靠得住的“宿主”，这个“宿主”就是庞大的西方中间阶层群体，这个群体有融资冲动且有偿还能力——或者说，有在西方金融家所玩资本游戏中扮演“群众演员”的意愿和能力。

但是，“虚拟经济”从两个方向摧毁了它赖以生存的中产阶层群体基础：一方面，支撑“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有钱人的盛宴”，它越繁荣，就会导致越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在这场资本游戏中，只有极少数中间阶层能够升到上层，而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坠入了社会的下层乃至底层。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兴盛，在相当程度上掏空了实体产业基础，而实体产业恰恰是孕育和支持中间阶层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所以，资本家一旦真的变成了“资本”家，资本的美梦也就到此结束了。须知，离开了底特律的发展，华尔街的持续繁荣是难以长久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西方中间阶层再也无力在资本市场“陪玩”下去的结果。

2011年，以“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占领百老汇”为代表的美国民众的抗议活动，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造成政治经济局面的强烈不满，也促使更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深度反思。

二、“西式民主”的衰退

2017年3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暂停对加州铁道6.47亿美元的拨款，加州铁道进行到中途的电气化改造项目将无钱为继。这意味着，美国首条高铁——加州高铁在国人望眼欲穿地等待了多年后，又一次被搁置。美国的高铁梦暂时圆不了了。搁置原因跟美国的党派竞争脱不了关系，加州的民主党人建设加州高铁的热情高涨，但是加州的共和党人则坚决反对高铁建设，认为那是浪费。高铁被搁置的深层原因，就是美国出现了“否决政治”——这是那位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学者福山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新发现。

资本主义所要求和催生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种种安排，对于推动人类社会摆脱各种封建的、宗法的旧制度束缚，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资本主导的逻辑使得旧问题被解决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更深刻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又起着决定性作用。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难理解，资本主导的逻辑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资本主导的政治。哪一种势力能够在攫取剩余价值中占据主导地位，哪一种势力就能够主导和左右西方政治，就能够获得统治地位，从而主导西方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

标榜民主政治的西方政治制度，是为了平衡和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关系而确立的，是确保经济领域的主导势力在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各种经济势力之间进行平衡和调节的一种制度机制。所以列宁说，“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政治外壳”^①。因此，从西方资产阶级

^① 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

登上政治舞台到二战之前，西方政治无论从实质还是表象上看，都是一种精英政治，精英阶层牢牢占据着各种上层位置，对内对外政策以满足和体现精英阶层的利益为优先选项。

冷战期间，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政治上的压力，为了增强资本主义社会的吸引力，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崛起了的社会中下层的政治诉求，也为了平息某些社会矛盾，西方国家不得不采取向社会中下层让渡和兑现某些政治权利从而换取政治“合法性”的若干措施，从而使得西方政治具有某种大众政治的特征。但是这种让渡和兑现，并没有改变精英政治的实质，而是使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具有了“精英政治的内核、大众政治的外表”，但也大体上维持了精英与大众在政治事务上的均衡。

冷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得益于西方政治霸权在全球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张，以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西方国家的中下层在从上层那里分享到部分“全球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享受到了霸权庇护下的所谓政治文明，精英与大众在政治事务上的平衡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持。因而，西方国家曾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学者福山所鼓吹的“历史终结论”。

问题是，如果说以中间阶层面目出现的西方民众，是资本市场的群众演员的话，那么，以有投票权的选民面目出现的西方民众，则是政治市场的群众演员。但与资本市场不同的是，在政治市场，群众演员经常被灌输自己是主要演员而且他们也自认为是这样。其实，群众演员终归是群众演员。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自由市场体系”的红利削减，西方国家滥用霸权导致的政治动荡与不安（如所谓的“文明冲突”、难民问题、移民问题、恐怖主义等）向西方国家进行传导的时候，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的平衡就遭到了空前的危机，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之间开始有了严重的冲突。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登的乔治敦大学贾森·布伦南的《反对民主》的文章竟然声称：“我认为，政治参与对多少人来说无益：它对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往往把我们变得又坏又傻。”是的，对精英来说，确实到了让群众演员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终归是群众演员的时候了！

面对问题和困难，西方国家势必要进行政策决策的重大调整。但是，资本主导的所谓的民主政治，使得这种调整十分艰难：一方面，资本主导之下的精英政治的实质，决定了这种调整必然要以削减甚至牺牲普通民众的部分政治权利和权益为代价；另一方面，误以为自己是主要演员的、被西方民主政治惯坏了的大众，无法接受这种调整，从而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的自我调节能力，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西方的困境。

三、“福利国家”的挑战

2016年4月，一场名为“黑夜站立”的社会运动在法国巴黎共和国广场不断发酵，参与者最初以学生和年轻人为主，后逐渐扩大到各阶层人士，地点也从巴黎扩展到法国数十个城市，折射出当前法国面临的重大社会危机。这个危机，实际上是发生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导逻辑驱动下的社会困境的外在显现。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人权维护体系，通常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优越性最有力的证明。然而，在这个所谓的优越性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们发现，资本要想实现增殖，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人的劳动。因而，在资本主导的逻辑之下，西方社会中的人以“劳动者”和“消费者”两种角色出现，这两种“跑龙套”的角色交替“抬轿子”，共同成就了资本这个主角。为了使“劳动者”能够持续稳定地提供优质劳动力，为了使“消费者”持续稳定地保持较强的购买力，西方国家统治阶层就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人权维护体系方面下一些本钱，这就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由来。

冷战期间，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比拼竞争力，西方国家又大大强化了各方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不乏从社会主义国家学来的一些制度。这些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西方国家在其内部造就了大批的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从而维持了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使得西方国家在其内部造就了大批的具有较强购买力的“消费者”，从而维持了较为庞大的国内市场。这就是资本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要采取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根本原因。

冷战结束之后，为了维持西方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借助于全球化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西方国家一度又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其社会福利制度，因为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和聚集优秀的人才，特别是金融和科技人才。

但是，“自由市场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也给社会福利制度模式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西方国家，由于不再过于依赖本国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在资本主导逻辑的驱使下，也就渐渐削减了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持续投入，使社会中下层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条件持续恶化。其次，西方中间阶层群体的持续衰落，使得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越来越沦落为“兜底线”的社会政策工具，从而使西方国家背负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最后，由社会条件恶化和“中产梦”破灭所带来的西方吸纳和聚集全球优秀人才能力的下降，反过来又降低了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

任何社会都具有动力、平衡和调整三种根本机制。“三种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三种最根本、最普遍的机制。动力机制，释放着社会发展的能量；平衡机制，保持着社会发展各部分之间的协调；调整机制，使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达到优化、协调和配合。如果说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发挥着动力机制的作用、民主政治发挥着调整机制的作用的话，那么，以社会福利制度为核心的各项社会制度，则发挥着重要的平衡作用。现在的问题是，且不说经济发展的停滞、民主政治的失灵，单从社会制度来说，西方各项社会制度所发挥的平衡作用也处于危险的边缘。当社会福利制度从一种鼓励社会成员干事创业的制度变成一种“兜底线”的制度的时候，当社会成员的创新创造活力由于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而受到严重抑制的时候，当人权制度从一种维护人的尊严的制度变成一种区分人、隔离人的制度的时候，西方社会也就陷入了失衡的危险境地。

四、西方话语权的式微

2017年1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就职演说，主旨是“让美国再次强大”，然而，其所声称的“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方法却让人瞠目